

妻子如衣服

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觀，是輕個人而重國群的。

「國家認同」，是為人之道的要義。而國與群，家還不算是個「群」呢；群是社會，家在群裏。國與家雖有同構狀態的相應關係，但當忠孝兩難全時，選擇國，是毫無疑問的。國家是天

地之大義。中國古代社會，男人既要盡忠於國家，又得盡孝於父母，卻讓夾縫中為人妻者，飽受折磨。

沒有國哪來家？家與個人，又必然以家為重：沒有家，個人是不存在的。因此，一個不愛家，不孝敬父母，對兄弟手足之情不珍惜重視的人，被視為禽獸不如。又若有堂堂男子漢，為兒女私情而捨棄大好前程，那是沒出息。因為早有古訓：「兄弟如手足，妻子如衣服。」衣服隨時可以換，破了亦可縫補。而手足是四肢，斷了，安可續？由此可見，舊時中國人是多麼的親情至上，血濃於水。做父母的，寧願見夫妻反目，也不願見到手足不和；離婚當然不是什麼好事，但卻不比手足相殘來得更教他們痛心疾首——本是同根生啊，相煎何太急？

「兄弟如手足，妻子如衣服」之所以成這千古名言，不就是因為中國傳統觀念，重視親情超過夫妻感情嗎？儒家思想更以血源親情為大。兄弟是手足，是血源至親；而妻子再親，也是外姓人。即使不是真知灼見，也是言之有理。

輕愛情重功名的中國傳統價值觀，一句「男兒志在四方」，



自由談

李憶君

便概括了男人的志氣所在。故而上京考試這一趟遠門，無論如何都得去的。至於那些自知無望金榜題名的，也得出門去做買賣。否則他家的門楣無論如何也光不起來。是以男人娶妻後，便得出門「放志」去。有幸的話，這被娶

回來的女人，即成為有志男人背後的「深明大義」女人。也因為她的識大體，顧全大局，她男人便「出息」了——此乃「有幸」；而「不幸」的，則只得得到個「鄉下髮妻」的虛有名分，守一輩子的活寡。

遠的不說，就說新文學時期的那一批文豪巨匠吧，隨手拈來，便有魯迅之於朱安、徐志摩之於張幼儀、郁達夫之於孫荃。這些女人，她們個個都稱得上深明大義，情深義重。但最後都成了「衣服」，被丈夫換掉了。她們中有糾纏怨恨的，也有哀默心死的，惟擾攘多時，終於在歲月中驚覺耗掉的是有限的青春，在頹然心灰中接受事實……在那一刻，她們有什麼想法呢？是絕望於命運從此只有更壞，而不會更好？抑或心中懷喪，懷疑自己是否耽誤了男人的前程？她們的憋屈，卻又是驕傲的，因此她們的男人都是文豪巨匠。

自古有言，成大事者，忠孝兩難全。有為的男人，自當有取捨。而這排名最末的兒女情長，竟然沒有她們的份。「今年花勝去年紅，可惜明年花更好，知與誰同？」她們生命裏最美好的那段，竟是如此渺渺茫茫地便過去

白蘭花

花店主人在店舖門口排列一個挨一個高瘦的桶子，裏面放着色彩繽紛的花朵，擠得熱熱鬧鬧的。有一些品種的花朵附在花枝上，一叢一叢的，互相靠攏；有些則攀上花莖巔峰，昂首矗立，傲然顧盼。紅妝粉黛爭妍鬥麗，要贏得惜花人的注意。唯有白蘭花，安靜地待在一旁，不爭不鬧，在紛雜的世界中，是非、名利統統與它無關。

店舖角落放着一塊發泡膠蓋子，白蘭花被裝在細小的透明袋子裏面，一袋一袋，整齊排列成上下兩行，每行數量相同。一片紙張，上面涼草地寫着「五元一包」四個字。五元，如今恐怕連一塊蛋糕也買不到吧？這許多年來，白蘭花的價格都在這個價錢徘徊，獨立於市場變化之外。

很多時候我經過花店，都會買一份白蘭花。到了夏天，我是沒有散發香氣的花就不能安心過日子的人。大概這是因為花香可以安撫情緒，鎮靜精神。我拿來一隻扁平的圓形碟子，注上水，然後小心翼翼地把花朵靠在碟子的邊緣放下，堆砌成一個花環，放在通風的地方，有風，香氣就



HK人與事

文秉懿

會隨着風飄揚，淡淡的。我也把白蘭花串起來，掛在風扇上，這樣，人造風被自然幽香感染，就會變得高雅和清淨。

小時候在街上見到女人，多數是上了歲數的女人，把白蘭花別在頭髮上。近年幾乎見不到這種打扮，這樣走到外面，可能會吸引好奇的眼光。不過我在家也學着以白蘭花裝飾頭髮，嗅着淡雅的花香，人也清爽起來。

我居住的屋苑種植了不少樹木，其中有一棵白蘭花樹，依偎一幢大廈生長，有十來二十呎高。夏天是白蘭花綻放的季節，人經過那個範圍，要是跟花有緣，又得到風的歡心，風就會為你成就一樁美事。清風徐來，承載一抹芳香，悠悠拂面，立即覺得身體輕巧。每一次我走過這裏，只要時間許可，我都會停在樹下，什麼也不想，掛着微笑，就會有一股恬淡的空氣把我包圍起來。我浸泡其中，加上一點誇張的想像，雖然未能成為無所待的逍遙神人，也可以稍稍脫去一點俗氣。我稱這種行為為「偷香」，聊以逗樂。

夏天，幸好有白蘭花。



人生在線

姚文冬

作家張楚給我發來一段視頻，是對劉秀榮主演的京劇《白蛇傳》。我回覆：「王派戲。」他問：「什麼叫王派戲？」我答：「王瑤卿的戲。王瑤卿是京劇界的『通天教主』，『四大名旦』梅蘭芳、程硯秋、尚小雲、荀慧生

都受過他的調教。劉秀榮是王派傳人。初演《白蛇傳》時還很年輕，周總理曾親切地稱她為『小白蛇』。」這番話，令張楚驚訝不已，直呼「非常漲知識」，表示要牢記在心。其實，這不過是我掌握的戲曲常識，有什麼新奇呢？但對於張楚，便是新奇、深奧之事。同樣一件事物，對有的人是常識，對另外的人則是盲區。你認為



流動空間

方元

在中國，很多人都知道上海有「萬國建築博覽會」之稱。在北方，也有一座被稱作「萬國建築博覽會」的城市——天津。在十九世紀中葉至二十世紀中葉，天津曾設有八個西方國家的租界區，因此稱作「八國之城」。二戰前的天津看上去儼如一個小歐洲，「萬國建築」是誇張，但確實可以見到歐洲多個國家的建築風格。如今，這些西式建築成為遊客「打卡」的景點。

人們經常將上海和天津看作是同類的城市，以至有人將天津稱作「北方的上海」。確實，兩座城市都曾有過外國的租界，都是經濟商貿中心，都很西化，都保留了許多西式建築等等。不過，如果用看上海的角度和方法去看天津，那將失去天津的特點。

天津的一個最大特點是，它就在皇上的眼皮底下。天津於一八六〇年對外開埠，比上海晚了十八年。這並非因為它的港口不如上海的好，而是因為它作為京城的門戶和華北的經濟中心，地理和戰略地位十分重要，因此皇上自然不想讓洋人在眼皮底下生事。

事實上，英國人很早就向中國提出開放天津的要求。一七九三年六月，英王特使馬戛爾尼勳爵率領一個龐大的外交使團，乘坐三艘大船，滿載六百箱禮物到達天津大沽港口。英國的盤算是，在已開放的廣州港口之外，再要求中國開放寧波舟山（而不是上海）和天津，從而使英國在華南、華東和華北獲得三個立腳點。這些要求被乾隆皇帝傲慢地拒絕了。

時隔六十年，當一八五八年英國人再次來到天津的時候，船上載的不再是禮品，而是大炮。驚慌失措的清政府被迫簽下《天津條約》，開放南京等十個新的「通商口岸」，但再次拒絕開放天津。一八六〇年，英法聯軍攻入北京，迫使清政府簽署《北京條約》，並將天津加入在「通商」城市的名單上，由此開啟了天津外國租界的歷史。

所謂「八國之城」是一個籠統的概念，有虛有實，有是有非。其實，「八國」既非一日建成，也非同日建成。一八六〇年開埠之初，僅有英、美、法三國租界。一八九四年甲午戰爭之後增加了日、德兩國租界。一九〇〇年又增加

到後也沒當回事，不然會給以色列人解救人質帶來很大的麻煩。

以色列的車隊一抵達老航站樓，突擊隊員們迅即跳下，向樓門衝去。樓門「嘰」地一聲被衝開，突擊隊員們按照事先的約定，用希伯來語高聲喊道：「趴下，都趴下！」大廳中的人質聽到母語發聲，都本能地趴在地上。劫機者和烏干達軍人不知所以，站在原地不動，一下子將自己凸顯出來，成為突擊隊員掃射的目標。他們見狀慌了手腳，只是胡亂還擊。約納坦一邊喊叫，一邊帶領突擊隊員繼續向裏衝。但是，尚未到達預定位置，他卻突然倒地。其他突擊隊員只顧繼續向裏衝，沒有停下腳步。他們從大廳向相鄰的房間，手槍、衝鋒槍、手榴彈交替使用，很快將八個劫持者和三十多名烏干達士兵全部消滅。整個戰鬥持續大約二十分鐘。等他們回過頭來搶救倒地的約納坦時，發現他失血過多，已經停止呼吸。最後清點

稀疏平常，別人卻如獲至寶。反之亦然。

曾經，我的思維裏有一個誤區——我熟悉的常識，別人也一定熟悉。比如，你若讓我給人講「桃園三結義」的是哪三個人？我會羞於出口。而事實是，我連問了五個人，居然有兩個搖頭，還有一個拿不準，他試探着問：「是不是劉備、關羽、諸葛亮？」自此我明白了，不要認為常識淺白，每一種常識，在沒有成為常識之前，都是新奇、深奧的知識。

以前我看別人的文章，發現只要提到典故，作者都喜歡將其複述一遍，比如，文章提到了孔融，就繞不開「孔融讓梨」，非要把讓梨的事娓娓道來，儘管主旨與讓梨關係不大。真有人沒聽說過「孔融讓梨」？所以，我覺得這種寫法純粹是「米不夠水來湊」，同時也懷疑作者是在嘲笑

讀者孤陋寡聞。但後來，我改變了這種看法。因為我體驗到了閱讀常識的好處。最近，看了一篇文章，提到了兩個「偽皇帝」——張邦昌和劉豫。我知道張邦昌，但對劉豫有些陌生。因此，特別希望能從文章中看到劉豫的詳盡介紹，果然，作者對劉豫怎樣當上「皇帝」，怎樣與南宋對抗，又怎樣在金朝高層的政治鬥爭中失敗等經歷不吝筆墨，讓我直呼過癮。或許，這段描寫，對作者來說是常識，對一部分讀者可能也是常識，似乎可以省略，但對於我，恐怕還有更多讀者，卻是缺之不可的。

我想對作者說：「這樣的常識，我曾遺憾地在歷史書中無緣，或者說錯過了，但是，卻能在你的文章裏重新相遇，這是我的幸運。」所以，這種出現在文章裏的常識，不是「水分」，而是「血肉」。

八國之城



◀大清郵政局辦公樓建於十九世紀末，現為天津郵政博物館

方元繪

了俄、意、奧匈、比利時四國租界。即是說，前後有九個國家在天津設置租界。一九〇二年美租界併入到英租界後，天津至此形成「八國之城」。

天津開設外國租界的歷史有八十五年，但八國租界同時存在的時間僅有十七年。一戰之後，中國收回了天津的德國和奧匈的租界。俄國革命之後，蘇維埃政府宣布放棄沙皇時代在中國攫取的特權，交還天津的租界。一九二九年比利時也交還了租界。在二戰之前，天津尚餘下英、法、日、意四國租界。租界的增加或減少，反映了中外國際關係的變化以及西方列強勢力的此消彼長。二戰之後，中國收回了所有的外國租界。

八國租界猶如各國在天津辦的示範區，以圖近水樓台影響北京的朝廷。而負責洋務的實權人物——北洋通商大臣李鴻章乾脆就常駐天津，以便他實地觀察和比較各國租界的情況，了解西方的制度和運作方式，借鑒學習。天津因此成為「洋務運動」的中心和現代化的實驗場，創造出許多「中國第一」，例如第一個現代郵政局，第一條電報線，第一所西式大學等等。這是天津的另一個主要特點。

在講天津近代史的時候，學者和傳媒往往聚焦在八國租界，而忽視了天津老城的存在，忽視了中國主權的存在。其實，對於天津這段歷史，更合適的講法是：「一國九制之城」。重要的是，作為中國的學者，我們需要改變那種習慣以西方為中心，從西方的角度看中國歷史的方式。

對於上海、天津這種曾有外國租界的城市，中國社會的主流輿論長期以來都是持批判的態度，把它們叫作「半殖民地城市」。建築學家梁思成在一九五二年講的一段話頗有代表性：「過去一世紀以來，我國沿海岸的大城市赤裸裸地反映了半殖民地的可恥特性……帝國

主義的軍事、經濟、文化的侵略本質，在我們許多城市中的建築上顯著而具體地表現了出來。」因此，他號召中國建築師們「必須肅清許多城市中過去半殖民地的可恥的醜惡面貌」。

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，上海、天津等地由西方建築師設計的城市和建築被當作反面教材，受到批判。這種思想長期阻礙了對中國西式建築的研究和了解。歷史建築失修、損毀和改建的情況相當嚴重。

梁思成對西方帝國主義的批判是對的。然而，如果完全照搬政治的觀點，用政治的標準來評價建築的美醜，那將會低估建築本身的實際價值。例如，文藝復興建築、希臘古典主義建築、功能主義建築等等，無論在藝術形式上還是在建築思想上都不能說它們是醜惡的。實際上，只有放在特定的環境或特定的話語中，它們才會成為政治權力的符號。

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，旅遊經濟激活了天津那些垂危的老建築。歷史的恩怨暫擱一邊，昔日被批判的「半殖民地城市」變成受讚美的「萬國建築博覽會」。然而，迴避歷史問題並不能讓問題消失。對歷史建築進行修復和保護，這是好事。但把歷史建築拆掉重建，而且建得比原來更豪華，這是好心做蠢事。更有問題的是那些新建的、貌似歷史建築的仿製品，它們的出現就不是好事了。

對待歷史建築的方式，反映了人們對歷史的態度和認知程度。我們要想清楚自己在做什麼——是在粉刷建築，還是在刷「白」歷史？最近在美英等西方國家，「黑人的命也是命」運動引發了對歐美殖民歷史的重讀和反思，並波及到一些與殖民史有關的建築和雕塑。雖然這場運動遠在大洋彼岸，但對於同有西方殖民史的亞洲，我們將怎樣重讀歷史呢？

閃電救援

對解救行動一開始就發生的這個出人意料的戲劇性事件，以色列人可能過多想到的是阿明的魯莽，而低估了他的狡詐。據一位專門採訪國家宮新聞的烏干達記者說，阿明生性多疑，總擔心有人狙擊其座車。因此，他不斷變換座車的型號和顏色。這點，其實我也知道。我曾親眼看到他外出不坐自己的奔馳車，而是坐在作為警衛車的越野車中。以色列人未能及時掌握阿明的變通之道，因而難免受騙上當。恩德培國家宮的一位行政主管則認為，以色列人那天發生疏漏，除總統座車的顏色變換之外，還有忽略了烏干達與以色列行車之道不同。以色列車輛是靠右行駛，而烏干達則是靠左行駛。烏干達士兵素質雖然一般不高，但他們一眼就看出車隊行駛線路不對，心中頓時起疑，要求停車。

這就導致猶太人「反應過度」，開槍射擊。好在其他烏干達士兵沒有聽到槍聲，或是聽

許，拉賓率領內閣全體成員來到本一古里安機場，不少民眾從媒體上得到消息也自發趕來，歡迎「勇士們凱旋」。我多次聽以色列朋友描述，突擊隊員走下飛機，是一片勝利的雀躍歡呼；獲救人質同家人相見，悲喜交加，抱頭痛哭；傷員和逝者的擔架一出現，所有在場人員都屏息佇立，低頭表示哀痛。佩雷斯在回憶錄中說，這是以色列國防軍承擔和完成的一項最大膽、最危險的任務，一項距離家國最遠、距離敵人最近的任務。他稱讚約納坦是一位傑出的指揮官，「以自己的勇敢征服了朋友、戰勝了敵人，以自己的犧牲換來全體國民頭顱的高高昂起。」政府在耶路撒冷為他舉行了隆重的安葬禮。他參與和指揮的這次恩德培反劫機行動，因神速如閃電而被稱為「霹靂行動」，因神勇無畏也被稱為「約納坦行動」。

（「恩德培行動之始末」之六，標題為編者加）

如是我見

高秋福

